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POWER

· A Radical View

权力

一种激进的观点

[美] 史蒂文·卢克斯 著
彭斌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D033/15

2008

POWER

A Radical View

权力

一种激进的观点

[美] 史蒂文·卢克斯 著
彭斌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美)卢克斯著;彭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2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ISBN 978-7-214-04887-5

I. 权... II. ①卢... ②应... III. 权力-研究
IV. 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19624号

Power: A Radical View

Copyright © 2005 by Steven Lukes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8 by JSPPH

This edition i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Palgrave Macmillan Ltd and the translation license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even Lukes** care of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5-303

书 名 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
著 者 [美]史蒂文·卢克斯
译 者 彭 斌
责任编辑 蒋卫国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960×1304毫米 1/32
印 张 7 插页4
字 数 145千字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4887-5
定 价 20.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译者的话

史蒂文·卢克斯教授出身于牛津大学，在哲学、社会学与政治学方面造诣很深。《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是卢克斯教授的代表性著作，同时也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中研究权力的经典性著作，它自1974年第一次出版以来就在西方学术界和政界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赖特·米尔斯教授于1956年出版《权力精英》一书以后，西方学者就权力问题展开过非常激烈的争论。1957年，社会学大师塔尔科特·帕森斯与米尔斯教授进行了交锋，他不赞同米尔斯教授所指出的美国权力与财富是由少数统治精英控制的观点。随后，耶鲁大学的罗伯特·达尔从行为主义的立场批判了米尔斯教授的“权力精英”理论，他提出一种根据存在于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可以观察到的明显的冲突行为来界定权力的主张，同时通过实证研究指出美国是权力多元分布的社会。达尔的观点引起了彼特·巴卡拉克与摩尔顿·巴拉兹的不满与批判，同时也使得许多学者加入到争论中。巴卡拉克与巴拉兹认为，以达尔为代表的多元主义者对于权力的研究仅仅强调了权力的一个方面，即权力可以通过公开的和可以观察到的形式进行运用；但是，权力还具有隐蔽的一面，权力运用在很多情况下

可能并不存在明显的可以观察到的冲突行为,而且拥有权力的人也可能不会进行决策制定。所以,巴卡拉克与巴拉兹认为权力存在着两种维度:权力运用存在于可以观察到的明显的或者隐蔽的冲突中,它既可以通过决策制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也可能存在于不决策的形式中。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英国的拉尔夫·密里本德与法国的尼克斯·普兰查斯这两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权力问题上就行动 vs. 结构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前者将权力理解为存在于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则将权力理解为某个社会阶级实现其特定的客观利益的能力,并且这种能力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卢克斯教授1974年出版的《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作的。卢克斯教授在批判性地分析达尔的“第一种维度的权力观”和巴卡拉克与巴拉兹的“第二种维度的权力观”基础上提出了“第三种维度的权力观”。他认为,第三种维度的权力观是对以行为为中心的权力的批评,它不仅关注于以决策或者不决策表现出来的决策制定行为,而且关注于议程控制;不仅关注于进入到政治议程中的各项议题,而且关注于那些被排除在政治议程之外的各项潜在的议题;不仅关注于可以观察到的明显的或者隐蔽的冲突行为,而且关注于潜伏着的冲突行为;不仅关注于人们的主观利益,而且关注于其客观利益。

在2005年的新版本中,卢克斯教授更加精致地论证了“第三种维度的权力观”。在20世纪70年代后,曾经占据西方社会科学主流地位的行为主义与结构—功能理论已经衰落,那些或多或少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权力理论得以兴起:耶鲁大学的斯科特教授通过调查研究认为,那些处于依附地位的从属者在日常生活中会通过各种秘密的与隐蔽的方式进行反抗;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普热沃斯基指出,从属者所以在大部分时间内默认其从属地位是因为他们获得了某些好处作为他们处于从属地位的回报;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厄尔斯特则提出“适应性偏好”的观点,认为被支配者不可

能自愿服从支配者，他们只是为适应无法改变的现状而调整自身的偏好。同时，著名的法国思想家福柯与布尔迪厄也提出了对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思考权力的新范式。卢克斯教授在新版本中用新增的两章剖析了权力理论的新进展，并在此基础上为自己所提出的三维权力观进行了新的论证。在新版本的第二章中，卢克斯教授强调其主题是“作为支配的权力”，它主要关注“支配者是如何得到他们所支配的那些人的自愿服从的”。在随后两节中，他在探讨福柯的“过于激进的回答”之后指出那些受到福柯影响的著作往往没有理解福柯著作的实质。在第三章中，卢克斯教授首先阐述了1974年版本中存在的错误或不妥之处，并且重新探讨了支配的机制。然后，他批判性地分析了斯科特、厄尔斯特与布尔迪厄的基本观点。最后，他剖析了“虚假的意识”与“真正的利益”的观念，强调它们“经过适当的提炼后对于理解第三种维度的权力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不可否认的是，正如卢克斯教授自己指出的那样，他对于权力问题的回答在本质上也是具有可争议性的，例如，人们往往会要追问，作为支配的权力的正当性依据何在？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卢克斯教授的三维权力观念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但是，他在很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又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和误读。所以，这就需要在分析卢克斯教授三维权力观的基础上不断深化讨论与研究权力问题。

卢克斯教授的《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是一本非常重要的研究权力的著作，它对我们理解权力问题必将起到很大的帮助。

译者谨识

致 谢

vii

我深深地感谢下列同仁不怕麻烦对我所提出的各种论点进行评论：Vivek Chibber, Jerry (G. A) Cohen, Stan Cohen, Suzanne Fry, David Garland, Ian Hacking, Russell Hardin, Colin Hay, Clarissa Hayward, Jennifer Heerwig, Stephen Holmes, Steven Loyal, Katha Pollitt, Adam Przeworski, John Roemer 与 Gail Super。我也想感谢我的出版者 Steven Kennedy 非常严谨的审稿风格和不遗余力地督促我不断修改。

三十年前,我出版了一本题名为《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的小册子。它在下述有趣的问题上有助于当时主要存在于美国政治学者与社会学者中间正在进行的争论,即:如何在理论上思考权力,如何用经验的方式研究权力。然而,更为根本的是正处于争论中的另一个问题:如何描述美国政治的特征——它是由占支配地位的精英进行的统治还是表现为多元主义民主。非常明显的是,如果想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就必须回答第一个问题。我曾经认为,并且现在仍然认为,我们需要从广泛的而不是狭隘的视野中来思考权力,也就是需要在三维状态中而不是一维或者两维的状态中来思考权力;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那些最不容易观察到的权力的方方面面:事实上,权力在最不引人注目的时候是最有效的。

在我撰写《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时,人们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各种关于无权无势(Powerlessness)与支配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其中,在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出版的下述两本著作尤其值得注意: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权力精英》(Mills 1956)与弗洛伊德·亨特(Floyd Hunter)的《社区权力结构:一项关于决策制

定者的研究》(Hunter 1953)。米尔斯在其著作的开篇就曾指出：

普通人的各项权力被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所约束，但是，即使在这些工作、家庭与邻里关系的包围中，他们通常看起来似乎是由各种他们既不理解同时又不能控制的力量驱动着。(p. 3)

2 米尔斯继续写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种意义上的普通人”：

当信息与权力的手段被集中起来的时候，某些人在美国社会中逐渐占据了可以高高在上往下蔑视他人的位置，也就是说，他们的决策能够强烈影响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世界……他们的地位可以使他们作出具有重要意义的决策。相对于他们所占据的关键职位而言，他们是否作出诸如此类的决策并不重要：他们没有行动或者他们没有作出决策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并且这种行动通常比他们作出决策更加有价值。因为他们主宰着现代社会中主要的等级制度和组织；他们管理着大型企业；他们支配着国家机器并且拥有各种特权；他们控制着军事组织；他们占据着社会结构中的战略性指挥地位，所有这一切集中了他们所享有的权力、财富与社会声望的各种有效手段。(pp. 3—4)

米尔斯的著作既是一本社会科学的巨著，同时也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艾伦·沃尔夫(Alan Wolfe)在2000年关于该书再版的编后记中恰当地评论道，“C. 赖特·米尔斯满怀热情的信念使他比那些更客观同时也更冷静的同龄人更加科学地理解了美国社会”，尽管他的分析完全可能由于低估了那些精英权力的影响和那种对“迅速的技术变革、剧烈的全球竞争与经常变动的消费者趣味”的调控而受到批评。用沃尔夫的话来讲，米尔斯比他所处的时代中那种被描述为

“多元主义”(这种观念宣称,“在美国社会中,权力的集中不应当被认为是过分的,因为某个集团总是在平衡着其它集团的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终结”(这种观念意味着,“在各种观念之上的崇高庄严的情感都业已耗尽”,以后“我们将通过技术专家来解决我们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科学阐释“更加中肯”(参见 Wolfe 2000: 379,370,378)。

尽管亨特的著作更加低调并且通常也更加专业(米尔斯形容它³是一本由“不想通过粗制滥造的作品来自欺欺人的正直坦诚的调查研究人员”写就的“技术精湛的著作”),然而,它仍然得出了与米尔斯的观点相类似的结论,也就是认为在美国社会地方层次上存在着精英控制。这是一项“在50万人口的城市——我决定将其称为**地区性城市**——中领导阶层模式”的研究。亨特的结论是:

政策制定者拥有一套他们控制着的相当明晰的制定政策的方案……在各种更古老的联盟中,那些要求进行变革的主张通常并不强硬或持久,政策制定者认为没有必要将每一种不很重要的变革都诉之于民众。操纵模式变成固定不变的了……在社区中,普通人“乐意于”这种过程可以继续下去。从各种小规模调整到诸多主要问题的解决都存在着某种滞后(carry-over)。……人们服从于掌权者的决策也就成了习惯。……那种对待相对来说没有权力的社会底层民众的办法是……警告、威胁、恐吓以及在极端状态中的暴力。在某些情形中,这种方式可能包含着隔绝所有支持性的资源——其中包括他的工作因而也就是他的收入。“分而治之”的原则在社区中的运用就像它在更大单位的政治格局(political patterns)中的运用一样,并且它也是同样有效的……高层领导人在与基本文化意识形态相关的重大问题上大多数时候是基本保持一致的。在这样的时代,根本

不存在来自任何下层社会民众对基本价值体系的威胁。在**地区性城市**中,那些处于大量人群中的个体在政策决定中没有发言权。这些个体都属于沉默的群体。那些专业化的社会底层的声音可能对政策具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是,它也通常被忽视。更大量的信息流动是自上而下的,然而,它本来应当是自下而上流动的。

4 所以,举例说来,亨特描述了“那些控制公私机构支出费用的真正有权力的人”是如何“致力于社区中健康与福利项目”的,同时,在社区中“从午餐俱乐部到兄弟联谊组织”各种各样的协会是如何“……被那些通过各种间接方式运用其影响力的人控制的——这些方式可能会在‘务实’的措词下聚集起来,以期在除了那些已经被权力集团认可的问题之外的所有问题上压制公众的讨论”(Hunter 1953:246—9)。

这些关于精英支配无权无势的民众的引人注目的描述引起了集中在耶鲁大学的部分政治科学家与理论家的回应。在一篇发表于1958年《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的题为“统治精英模式批判”的论文中,罗伯特·达尔十分尖锐而明确地提出了批评意见。他写道:

一个值得注意的并且真正令人惊讶的事实在于,米尔斯教授与亨特教授都没有认真地尝试着通过解释一系列明确具体的事例来检验其主要的理论假设。但是,我认为,在最近数年的社会科学中,这两部著作比任何其它著作都想要将复杂的政治体系在本质上解释成有关统治精英的情形。

达尔的批评是直接的和坦率的。需要做什么是显而易见的,即:存在统治精英的假设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够得到严格的证明:

1. 理论假设中的统治精英是得到明确界定的集团;

2. 存在着一种包含各种关键政治决策情形的合理的事例，在这样的事例中，那些理论假设中的统治精英的偏好与任何其他能够让人想到的合乎要求的集团的偏好是背道而驰的；

3. 在诸如此类的事例中，精英的偏好通常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达尔 1958:466)

这种批评及其所提出的方法论出现在达尔的经典著作《谁统治?》(Dahl 1961)中。在这本著作中,达尔研究了纽黑文市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权力与决策制定,并且引出了大量关于社区权力研究的著作。这本批判性的著作所针对的是“统治精英模式”与更加广泛地受到马克思主义激励并与之密切相关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其方法论是集中在决策制定上的“行为主义”方法论。这就在本质上意味着将权力等同于权力的运用(这让人想起米尔斯曾经写的,制定决策实际上并不比处在可以制定决策的职位上更加重要)。在达尔关于城市重建、学校废除种族歧视以及政党提名等例子中,与学者们所看到的米尔斯和亨特的随意用法相反,权力被看做既是与各种个别的、分开的与单独的问题相关的,同时又是与其运用的局部环境密切相连的,该项研究所提出的问题是:相关行动者拥有多大程度的权力是与既定时间与空间中所选择的关键问题——所谓的关键问题就是指那些影响多数公民的问题——相关的。在这里,权力被认为是与目的相关的(intentional)和积极能动的:事实上,权力是通过研究其运用而被“测量”的,也就是通过确定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中谁赢谁输的频率分析——谁在决策制定的情境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得到“测量”的。在这一点上,决策制定的情境就是指,各种游说团体或者采取不同政治立场的政治行动者在政治舞台上所展示的不同利益之间相互冲突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利益被认为是各种明显的偏好,而权力的运用就在于战胜反对派,也就是压倒各种相反的偏好。达尔这本

著作的实质性结论或者调查结果通常被贴上“多元主义”的标签：例如，它宣称，由于各种不同的行动者与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问题领域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不存在包揽一切的“统治精英”，而且权力也是多元分布的。更一般地讲，这些研究想要通过揭示在不同的重要问题上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赢家来证明在地方层次上美国民主是健康的，并且它们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证实。

在这里，无论是方法论上的问题（我们将如何调查与界定权力？）还是实质性的结论（权力的分配在多大程度上是民主的或多元的？）都是具有分歧的，正如在它们之间的连接纽带那样（方法论是否预先确定了这些结论呢？它是否排除了其它的结论呢？）。这些问题在那些随之发生的争论中得到了探究。批评家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挑战了颇有几分自鸣得意的多元主义民主的图景（Duncan and Lukes 1964, Walker 1966, Bachrach 1967），他们质疑多元主义民主描述的精确性（Morriss 1972, Domhoff 1978），同时他们也批评了多元主义者所采用的“现实主义的”（与“乌托邦主义的”相对）、在最低限度上所要求的“民主”观念；用一位批评者的话来讲，这种民主观念提出，民主应当仅仅被理解为一种“在政治体系中精英成员之间为争取正式的领导地位而进行有限的与和平的竞争”（Walker 1966 in Scott (ed.) 1994: vol. 3, p. 270）的方法。这种观念起源于约瑟夫·熊彼特对“古典”民主观的修订版本。对于熊彼特及其多元主义的追随者而言，民主现在应当被看做是“一种达成各种政治决策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使人们通过竞争民众选票的方式获得进行决策的权力”（Schumpeter 1962[1950]:269）。多元主义的批评者——他们被令人误解地称为“新精英主义者（neo-elitist）”——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过于没有抱负的并且实际上是精英主义的民主观；同时，他们认为其权力平等的观念“被描述得过于狭隘”（Bachrach 1967:87），而且其真

实的**权力**概念也是过于狭隘的。彼特·巴卡拉克与摩尔顿·巴拉兹认为,权力具有没有被多元主义者认识到的同时也没有被其调查研究的方法论所察觉到的“第二张面孔”。权力并不完全表现在各种具体决策中;研究者也必须考虑到,尽管在社区中存在着各种严重的然而却是潜在的权力冲突,然而,某些人或者协会可能会通过影响社区的价值、政治程序和仪式典礼将决策制定限制在相对没有争议的问题上。

所以,“如果某个人或者集团在某种意义上——有意地或者无意地——制造或者强化了将各种政策冲突公开化的障碍,那么,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拥有了权力”(Bachrach and Baratz 1970:8)。同时,为了支持这种观念,他们引用了 E. E. 谢茨施耐德(Schattschneider)富于雄辩的言辞:

所有政治组织形式都倾向于发展某些冲突而压制另一些冲突,因为**组织本身就是对某种倾向性(bias)的动员**。某些议题被安排进入政治领域中,而另一些议题则被有意识地排除出去。(Schattschneider 1960:71)

然而,反过来,这引起了各种更深层次的问题。研究者过去是如何调查分析诸如此类的“影响”(他们称之为“不决策”)的呢?——特别是当上述“影响”超出了幕后的议程设置、潜在对手之间的合作或选举等范围并且有可能成为“无意识的”和包含着“价值”与“仪式”的作用的时候。在多元主义者反击的压力下,巴卡拉克与巴拉兹稍微作出了些让步,指出如果他们的权力的第二张面孔能够被展示出来,那么必须总是存在着可以观察到的冲突;如果没有诸如此类的冲突,那么人们只能假定存在着“对于各种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分配的一致同意”。如果没有可以观察到的(明显的或者隐蔽的)冲突,人们必须假定“一致同意”是“真实的”。但是,人们为什么应当排除在这样一

种方式中权力可能会被用来保障同意并且因而避免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呢？

与谢茨施耐德关于压制各种潜在冲突的体制“偏见(bias)”的思想观念相伴随的是,这种思想不可避免地令人回想起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概念,特别是葛兰西在其《狱中札记》中运用“霸权”(egemonia or hegemony)的概念形式所阐释的思想观念^①。当葛兰西在意大利法西斯监狱的牢房中面对着革命在西方失败的时候,他已经在深刻地思考下述问题:在当代社会情况下,特别是在民主条件中,人们为什么会赞同资本主义的剥削呢?诸如此类的同意应当如何理解呢?他的回答——人们对于这种回答存在着许多种阐释——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大西洋两岸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

其中一种阐释是,葛兰西认为,在“当代西方社会结构”中,由于资产阶级对“意识形态机构”(Althusser 1971)的垄断,“文化”或者“意识形态”构成了“获得了同意的阶级统治模式”(Anderson 1976—7:42)。正如费米亚(Femia 1981)所写的,葛兰西

8 利用了存在于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某种不重要的(或者,至多是原始的)观念,发展了其潜在价值,并且在他自己的思想中赋予它一种中心地位。通过这种方式,葛兰西使马克思主义分析转变到长期被忽视的——并且也有希望成为科学的——理念、价值与信仰的领域。更为明确的是,他揭示出什么将成为第二代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Hegelian Marxists)(例如,法兰克福

① 对于葛兰西而言,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准则就是他们所认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Marx and Engels 1965[1845]:60)关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讨论,请参见:Williams 1965 和 Bates 1975。